

先秦諸子初探

刘毓璠





先秦诸子初探

刘毓璜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先秦诸子初探

刘毓璜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90,000

1984 年 10 月第 1 版 198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800 册

书号: 11100·135 定价: (平) 1.90 元

责任编辑 李怀道

前 言

小时候做塾课，读《四书》、《五经》，琅琅上口，心中却不甚了了。读大学时，在师友指点下，开始涉猎经子群籍，但研习未精，徒呼负负。工作期间，暇时偶一翻检，记下点滴心得，有亲切之感；可是，成堆的问题如潮涌来，常使思考深不下去。十年内乱中，这块学术阵地在横蛮干扰下，显得更不宁静，使我在困惑之余，特别感到沉痛和义愤。决心在七旬垂暮之年，踊跃赶上拨乱反正的形势，把有限的智慧和精力，投入先秦诸子的重新探索中去，尝试对这一重大学术问题提出再学习的体会，做一点有益的工作，以无负于这个伟大的时代。这就是本书问世的由来。

战国时代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在这期间，社会阶级关系呈现着持续的动荡，刚从旧制度桎梏下获得新生的文化知识界，以不同类型的“士”结合起来，在学派旗帜下进行活动，驰骋着自己的辩说，表明对于时局的态度，逐渐形成了“百家争鸣”的高涨势头。基本过程是：当战国初期，在鲁都曲阜，儒、墨两家各立门户，发动争议，开风气之先。中期前后，在齐都稷下学宫，士人荟萃，议论风发，波澜迭起，蔚为一时之盛。到战国后期，随着局势的推移，在赵都邯郸出现名辩与墨辩之争。持续近两百年的学术“争鸣”也由此收场。

在先秦典籍中，当时不论任何学派，在社会身分上莫不自称为“士”，以擅长“推十”、“合一”的本领（见《说文解字》：释“士”），致力于独立的思维活动，成为我国历史上先行的专业知识队伍。他们的活力源泉是什么？在“争鸣”中各自有什么表现？其基本形势又是什么？这些，在文稿的有关部分都已结合当时的历史特点进

行了适当的表述，以期从错综复杂的内部与外部联系中，轮廓地再现学术“争鸣”的形势，使之符合于历史与逻辑的一致。

在新的文化专制主义没有出现以前，“百家争鸣”这个历史现象完全是个合理的存在。就发生程序说，孔子虽不代表中国学术的起点，却是学派活动的最早组织者。他在这个历史转捩点上挺身而出，以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为己任，作出创造性的贡献，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孔子这样的人物如何重新评价？如何体认“仁学”内涵的中国特色？儒学成为“显学”后，又如何迅速转向分化？对当时及后世学术发展的趋势影响如何？对于这些问题，文稿从新的起点上逐一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商榷的意见，表现了明显的倾向性。

在这个变革时期，道家思想渊源也较早。就道体观说，老子的贡献并不在于最先发现了“道”，而是第一次把它提到哲学的最高范畴上来，开始进入体系化。就目的论来说，老子的“道”本为“佐人主”、“莅天下”（同见《道德经》）而设，有它自己的功利主义，没有理由不加分析，把它塞进纯“隐士哲学”，硬派为“倒退论”者。文稿参照帛书《老子》，对王弼注本可能有篡改的迹象进行了质疑，并为道家思想派生出“黄老刑名之学”提供一些新的线索，以反证申、韩之学“皆原于道德之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试图对这个思想痼结有所突破。

作为新起的社会意识形态，法家思想的酝酿成熟反而为时较晚，不早于战国中叶。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个发生过程也是曲折复杂的。文稿从分析法家思想产生的两个基地出发，认为汇编于齐国稷下的《管子》与胎息于三晋的《商君书》，正是当时东西对应、齐头并进的两大法系。它们分途发展，各具特色。经由稷下“老师”荀况的传导，直到战国末年，才由他的门徒韩非集“商、管之法”的大成，实现有体系的思想合流。

文稿还辟出一定篇幅，分别研讨了墨家思想的人民性，阴阳

家思想的渗透性，以至杂家思想的实用综合性问题；也给“名辩”逻辑思维必须保持其严格独立性提出粗略的一隅之见。

这样匆匆一个巡回，就给“争鸣”基本形势勾画出隐约的轮廓。自初探以来，情切“温故”，寝馈群经、群子，不觉已四易寒暑，历时可谓“匆匆”；但能在有生余年，有机会让我专心致志，按预定计划走完这一“巡回”，更不禁感到幸福和兴奋。我自愧限于资质，学诣未精，不可能在短暂“巡回”内，做到“探赜索隐”，记下多少条“新知”的心得。而比较地说来，经过这一回新的研习，深切感到二千多年前的“士”人队伍，不管属于哪家哪派，都在关心国家大事，重视社会现实，加强德业修养，在锻炼思辩和表述能力等方面，同样地尽到能动的努力，表现了很不平凡的思想境界。他们在不同的学术环境中，不管是曲阜、邯郸，还是临淄的稷下，基本上保持着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互相批判而又互相吸收的关系，处于“和平竞赛”的精神状态之下。只是碰到某些特定的命题，才有意识地形成壁垒，出现针对性的交锋。从这个“争鸣”形势的轮廓中，看出当时人们有多少思想感情倾注在“拨乱”、“求治”的共同目标上，各自凝结为不同的语言，却又从不同方面标示出中国文明的特色，影响到整个民族精神的持续发展，其意义十分深远。

“百家争鸣”是我国古代罕见的历史现象。在初探中，我把这一突出现象放到特定的历史范畴下去考察，力求做到从实际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从初探实践中，我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史论结合”才是唯一正确的治史方法，而结合的效验见于平时的涵泳，不在于临时的爬梳。这是一个“功底”问题。在这方面，我自问学植疏浅，有志未逮，所以在立论上只求开宗明义，不驰骛于高深；在取材上唯据白文通释，少反复于考证；在结构上但顾大体骨架，未绸缪于重点。如何把“初探”再深入下去，进行必要的充实与提高，积极迈向下一次的“续探”，愿以期诸来日。

我不是哲学工作者，缺少这方面的素养，不当与错误之处在

所难免。这十几篇思想史的习作，是以递交入门试卷的心情写出来的。在“初探”即将脱稿时，我殷切盼望着哲学、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和广大同好们给以严格的批评和指教。文稿编订中，承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提修改意见，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陈效鸿、邹旭光，研究生应海康相帮校对引文，在此一并致谢！

刘 毓 璜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目 录

前 言	1
一、《左传》、《国语》中见到的孔子	1
(一)孔子的家世和政治态度	1
(二)孔子讲求的“礼”、“法”、“仁”、“义”	7
(三)孔子的博学多能	15
二、要批判地对待孔子的仁学	20
(一)“复礼”和“归仁”	20
(二)关于“仁者爱人”	24
(三)“仁”的大节要求	31
三、孔子对教育文化事业的卓越贡献	34
(一)儒家学派的莫立	34
(二)教育工作的创造性成就	37
(三)孔子的文化整理工作	44
四、试论思孟学派对儒学的发展	49
(一)思孟学派的形成	49
(二)政治主张的“中庸”性	53
(三)“中庸”与“思诚”哲学	64
五、杰出的儒家异端荀况	74
(一)荀况的经历和学术地位	74
(二)关于荀子的自然观	80
(三)关于荀子的社会政治观	85
(四)荀子的认识论和逻辑方法	99
六、略论《周易》的哲学思想	108

(一)古代的卜筮活动.....	108
(二)关于《易经》思想.....	113
(三)关于《易传》思想.....	121
七、论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	129
(一)老子其人.....	129
(二)《老子》其书.....	136
(三)关于《老子》是不是兵书的问题.....	150
八、论老子哲学思想体系.....	155
(一)老子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	156
(二)关于老子的本体论.....	159
(三)老子的认识论和辩证方法.....	164
(四)关于老子的政治观.....	169
九、略论杨朱、庄周思想.....	174
(一)杨朱思想的过渡性.....	174
(二)关于庄周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177
(三)关于庄周的人生观和政治观.....	184
十、试论“黄老之学”的起源、内涵及其衍变.....	190
(一)“黄老之学”的起源.....	190
(二)“黄老之学”的基本内涵.....	198
(三)“黄老之学”的衍变.....	207
十一、法家学说形成和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220
(一)关于法家思想产生的基地问题.....	220
(二)关于法家学说的形成问题.....	224
(三)关于法家思想学说的集大成问题.....	230
(四)关于“儒法合流”问题.....	238
十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	250
(一)韩非的爱国立场和法治抱负.....	250
(二)关于集“商管之法”的大成问题.....	256

(三)关于道体论与辩证方法·····	270
十三、论墨家学说的人民性·····	277
(一)墨子和墨家学派·····	277
(二)墨子学说的人民性·····	280
(三)后期的墨学——“墨辩”及其他·····	290
(四)当时不同学派对墨子的评价·····	296
十四、“名辩”小议·····	302
(一)“名辩”和“正名”·····	302
(二)“名辩”和“形名”·····	311
(三)“名辩”和“墨辩”·····	321
十五、阴阳家小议·····	332
(一)关于早期的阴阳五行说·····	332
(二)关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341
(三)阴阳家学说的渗透性·····	347
十六、杂家小议·····	352
(一)吕不韦其人和《吕氏春秋》其书·····	352
(二)杂家思想的折衷主义倾向·····	358
(三)杂家思想的“实用”综合性·····	365

一、《左传》、《国语》中见到的孔子

在我国历史上，孔子是个有特殊影响的人物。两千多年来，他的脸上被涂上各种不同的色彩。其思想学说经过不断加工以后，成了封建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又在不同情况下影响和支配到各个阶级和阶层，产生不同程度的精神信仰。

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如何实事求是地根据他毕生的实践活动进行“批判地总结”，首先就存在着一个材料鉴别的问题。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检验的尺度对评价孔子的问题丝毫不例外。为了贯彻拨乱反正的要求，廓清围绕这一问题的层层雾障，这篇文章试图以《左传》、《国语》为主要依据，把孔子一生的政治和社会实践放到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下，进行一次直观的考察，当作探讨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为全面评价孔子提供一些补充的线索。

（一）孔子的家世和政治态度

《史记》称《左氏春秋》为鲁君子左丘明所作。《汉书·艺文志》称左丘明为鲁太史，“作《左氏传》”。《楚元王传》上说：“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与《汉书》同时流行的《严氏春秋》又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打开《左传》来看，作者既把《春秋》的微言大义，概括为“五十凡”，介绍孔子的立论要点；又在认为必要的地方，另以“仲尼曰”发论，作了一定的配合和引申，与书中“君子曰”两相呼应。这个关系是不寻常的。如果再拿《论语》上孔子借

左丘明自况(如反对“巧言令色”,不“匿怨”等)的话来印证一下,上述那些对《左传》作者的提法就更加灼然可信了。

作为“左氏之外传”(或“春秋外传”)的《国语》,作史体例虽不相同,但所记同为“实书”(王充,《论衡·案书篇》),可资参校得失。《国语·鲁语》中曾拨出一定篇幅,专记孔子的言行,其中有一些个别事实,在选辞立意上,正和《左传》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左传》记鲁大夫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从病中的嘱咐里,把孔子的先世勋业交代得一清二楚。他着重地说明:孔子的远祖弗父何本宋湣公嫡嗣,把君位让给了厉公。其曾孙正考父荣任上卿,连保戴、武、宣三朝,官位愈高,愈讲究礼节,自奉得很菲薄,连走路也循规蹈矩,不离方寸。这样的人“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左传》昭公七年*)而这个“达者”不是别人,就是知书识礼的孔丘。

孔子的姓氏从“子”从“乙”,在宗法关系上,承接商汤(子天乙)一脉而来。从正考父作《商颂》一事,看出孔子的贵族家世确实源远流长,来头不小。孔子在弱冠时,曾从鲁国返回宋国,娶丁官氏为妻。直到病危易箦之际,还当着门徒面前,口口声声自称“殷人”,(*《礼记·檀弓》*)讲了一大堆见鬼的话,表明不敢忘本。说孔子毕生的主要活动不代表奴隶主贵族的保守利益,当然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就事论事,自从正考父的儿子孔父嘉被华督杀害以后,这支殷商胄裔就不得不在防叔的带领下,狼狽地避难到鲁国。防叔一下马,做了陬(鄆)邑的封人。再过两代,到孔子的父亲叔纥时,孔门家世已一落千丈,迅速下降到普通武士的地位。这个环境变动对孔子的心理和思想变化,当然不得不起严重的影响。

《左传》记“诸侯之士”围攻偃阳,鄆人乞力抉门,“以出门者”。(*襄公十年*)这个偶见的事例,表明孔子的父亲叔纥并非“斯文”种子,而是一个孔武有力的“士”。孔子本人是不是大力士呢?在秦汉时代,的确也有人夸说“孔子之劲”,恰象他父亲那样具有“扶

植”、“举关”的本领。(《吕氏春秋·慎大览》、《淮南子·道应训》、《王术训》)姑不论其真实性如何,却可以从中发现一个问题:活动于鲁国历史舞台的孔子,打他出生那天起,就丧失掉祖祖辈辈在宋国那个世袭卿大夫的地位,开始获得“士”的身份,在他的身上经常表现出交割不清的双重性格。只要看看他在少年时期既醉心于“陈俎豆”的礼仪,又摔不开象“委吏”(“乘田吏”)、“会计”一类的事务,问题就可以看出眉目。

孔子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与《史记》上说他既“贫”且“贱”(《孔子世家》)相一致。怎样才能排除这个正在没落下降中“贫”、“贱”、“鄙”的地位呢?在孔子看来,眼前明摆着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夤缘介入仕途,直接向上爬;另一条是利用“官学下移”的好机会,来垄断贵族文化知识,开展私人讲学活动,作为“干禄”的资本。事实上,为了抓紧一切时机去碰碰运气,他的一生正是沿着这两条路子一步步走过来的。长时期的社会实践使得孔子在思想、言论和行动表现中越来越不具有他父亲那样一个武士的品质,而是另外一种“士”的品质。

由于鲁国宗室是“周公之胤”,鲁都曲阜是当时公认的礼教文化中心,作为“士”阶层的代表人物,孔子在通过一些私人关系(包括鲁太史左丘明)探得鲁国的文化宝藏以后,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上,“据鲁”和“亲周”的要求显然更加明确起来。但就现实需要来说,他所要“据”的“鲁”,已不是成王始封的鲁;所要“亲”的“周”也不再是丰镐奠基的周。在那激烈动荡的变革环境中,他的主流思想倾向并不代表什么“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要求,反而包含着许多有待斟酌损益的新内容。这种倾向转化为实践的过程,相当明朗地反映在《左传》和《国语》的撰述中。

在“据鲁”的大前提下,孔子所竭力拥戴和支持的,首先是诸侯一级的“公室”。这个保守主义立场集中表现在他对待鲁国国君的态度上。鲁昭公被逐那年,孔子才三十五岁,追降到了齐国,向

景公陈说“君君臣臣”之道(《史记·孔子世家》),做鲁昭公义务的辩护人。其后昭公客死乾侯,反丧于鲁,暂葬墓道以南,直到孔子为司寇时,才按照礼的规定,“沟而合诸墓”(《左传》定公元年)。这里,寥寥几个字,表明孔子对于“礼”的实践已经感动了《左传》的作者。

孔子任鲁司寇,在定公十年,时年五十二岁。在任职期间,只闻“断狱平允”(《阙里志》)之名,未见“妄人当诛”(班固:《白虎通·诛伐》)之实。如诛杀鲁大夫少正卯,《左传》、《国语》都只字未提,孔子那么多的门徒也从来没有评议,说明这件事的真实性是很成问题的。就是相定公会夹谷一事,《左传》上所记的,也比《史记》较为可信。这突出表现在:《左传》上所着重刻画,的,正是一幕伸张鲁国宗法正统地位的外交场面。作为精于相礼的专门顾问,孔子反复强调的四条原则(“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偪好”)已经在从容的揖让周旋中迸发出相当强大的力量,击退齐国的挑衅和威胁,从确保匹敌地位上赢得了齐人归田的胜利。

这以后不久,孔子就受到鲁国当权者的冷遇,被迫离开自己舍不得离开的鲁都,到各国周游了十几年,回鲁国时已六十八岁了。哀公把他尊为“国老”,安置在宾馆,给以优厚的礼遇。可是,他的声望越来越高,精神却一天天颓唐下来,原来的保守主义思想现在也成了强弩之末。齐田常(陈恒)杀简公,夺取了政权。孔子斋戒三天,跑去见哀公,请求出兵平乱。当哀公和季康子拒不理会时,他感到下不了台,只好自己来圆场说:“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左传》哀公十四年)

归根到底,从实践的要求出发,孔子这个保守主义者对挽救奴隶制所采取的途径,只着眼于局部的改良,而无意于全面的复旧。即使说是“从周”,也不等于无条件地照搬“周公之典”,而是从最大程度上进行“补苴罅漏”的工作,借以维持奴隶制于不坠,再现周初的礼治精神。在孔子心目中,实行王道是最高纲领,也是

自己的理想所在；但说现实点，把周道兴于东方，纲领就得放低一些，图王不成，还可以图霸。《史记》称孔子为鲁司寇，“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史记·孔子世家》）这个心理动态相当微妙，也极其自然。它从反衬的角度上，把孔子这个保守主义者的不彻底性刻画得维妙维肖。

为了千方百计地谋求自己的出路，争取到可以试用的机会，孔子在斗争实践中，有时甚至不把鲁国国君当做直接的靠山，转而依靠新起的“三桓”集团势力。这在《左传》有关部分中是可以得到具体说明的。其实，孔子所标榜的“据鲁”，与其说是“据”的公室，无宁说是“据”的私家。特别对于“三桓”的代表者季（孙）氏，他一面不断讥评其这也失礼，那也失礼；一面却对其炙手可热的权势大动歆慕之忱，甘愿寄身于篱下。在孔子大门徒中，做过季（孙）氏家臣（宰）的，先有季路（仲由），后有冉求，都干得很出色。子贡因擅长辞令，和“三桓”经常打交道，活动能量更大一些。对于这种实际情况，《左传》中都有明确的印证，说明这个政治关系很可能是从老师那里接过来的。就这个意义说，孔子在鲁国连任要职（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这段政治经历虽不很长，但他的真正后台并不是鲁定公，而是季桓子。

孔子本人和季（孙）氏关系的密切，不仅有在朝执政的一面，而且有退朝议政的一面。有时候，季（孙）氏刚一下朝，连上朝的礼服都来不及脱，就同孔子师徒们论起道来。（《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正是有了这种合作，孔子才对季（孙）氏一家的人情动态，也表示了特殊的关心。当“季氏殯士”时，孔子身有丧服，还是打算赶去赴宴（《史记·孔子世家》）；鲁昭公夫人卒，孔子在吊丧途中，也要“过季（孙）氏”看看动静（《左传》襄公十二年），把自己放到家臣的地位上去。

正是有了这种政治契合，人们才不难看出：季路（仲由）为季氏宰，处心积虑要“堕三都”，显然是受孔子教唆的。当时，孔子正

任司寇要职，掌握了一部分兵权，无形中做了门徒的后援。发动这个政治攻势，主要是利用“三桓”集团及其陪臣（如阳虎、公山不狃等）之间正在发展中的矛盾，把公室与私家长期对立的关系尽快地扭转过来，在被迫进行共同防御的前提下，迅速加强奴隶主贵族（“三桓”也是开明贵族）的内部团结，形成一个新的统治核心。等到季路堕费不成，反而遭到费人强大的反击，“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室，登武子之台”（《左传》定公十二年），形势确实十分危急，作为幕后挑动者的孔子，就不得不亲自赤膊上阵，指挥前台的殊死战斗了。

正是有了这种政治契合，人们才终于看出：孔子对于当时“陪臣执国命”的新起势力，也是抱着虚与委蛇的消极态度，不愿意达成真正的合作。如被目为“亲富不亲仁”的阳虎，企图利用“三桓”的嫡庶不和，以武力要挟为手段，迫使家主季桓子让出一部分权力。事态迅速扩大后，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对于这样的人物，孔子一直又忌又怕，回避犹恐不及。后来阳虎斗争失败，被迫逃往晋国，投到赵氏的门下。孔子听见了，还是愤慨不已，喃喃地骂了一句：“赵氏其世有乱乎！”（《左传》定公九年）

诚然，孔子任鲁司寇以前，确实感到自己“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很想对外拉点关系。当公山不狃伙同阳虎，酝酿着“以费叛季氏”，派人请他共商大计时，他曾经一度动了念头，打算应召出山，前往费城，象文王发迹丰镐那样，重兴周道于东方。（《史记·孔子世家》）但事实上孔子这回没有去成，门徒季路感到恼火，劝他不要去，他连连叫嚷着“不行”，脚跟儿却一动也未动，生怕去了会蚀身分。这以后不久，孔子开始交上好运，官升得很快，仅仅隔了四年，就和季路一起定下“堕三都”的密谋，把“不得意于季氏”的公山不狃放到自己的对立面了。

实践的检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严肃的，公正的，也是合乎逻辑的，而任何人的政治、社会实践又离不开历史的制约。孔子

生当春秋战国之际，从个人身世、社会关系到政治遭际，无时无刻不在时代潮流猛烈震撼之中。面临这个“礼崩乐坏”的严重时刻，象孔子这样出身的“士”，既不得不踟躇于贵族主义、保守主义的传统约束，从保护统治利益的原则上，继续与人民为敌；又可以凭借一些有利的条件，在整理文化遗产、开创私人讲学的长期活动中，接触到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由此产生出旨在改良现实的理想。这就规定了他在政治上，必然要依靠较有前途的开明贵族势力，抑制和打击新兴地主阶级的自发势力，从而实现“张公室”的终极目的。楚狂接舆深有感触地警告孔子，说什么“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他正是以旁观者的态度，向孔子指明此路不通，并不带有任何反对搞复辟的意味。如果在改造过的孔子形象中，确切反映出一些复辟的影子，那也只可能是历史塑造者们给自己留下的生动写照而已。

（二）孔子讲求的“礼”、“法”、“仁”、“义”

正是因为历史是真实的科学的存在，不是任何人一手把持下写出来的，所以任何历史塑造者们所使用的一些词汇，特别是其中常见的“礼”和“仁”，现在也有回到孔子当时的历史实践中加以再检验的必要。检验的重要途径是：认真核对一下《左传》和《国语》中当时直接记下的这些词汇，同今天被蓄意塑造、篡改了的究竟有多大出入？

不言而喻，孔子和鲁国的当政者季（孙）氏在政治立场上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达成契合，但实际上却是有合的一面，也有争的一面，而争来争去，无非为了一个“礼”字。“礼”是孔子唯一的斗争武器。在没有达成真正的政治契合以前，孔子在思想上对季（孙）氏总是信不过的。平时看到一些失“礼”的情况，还可以勉强耐着性子，在门徒面前议论一番，发发怨气了事，到了矛盾愈来